

目 录

第一辑 跨文化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猿跨文化 圆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主潮

苑跨文化还是泛文化——世纪之交比较文学
研究的战略性转变

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第二辑 跨文化比较诗学

缘世纪中西比较诗学述评

苑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

愿思想反叛浪潮的起落——愿-愿世纪



中外文化与文论思潮比较

员舜班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

第三辑 :中国古代文论与东方文论

员舜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

员舜总体文学角度认识《文心雕龙》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价值

员舜返虚入浑摇积健为雄——唐代诗风与司空图的雄浑观念

员舜中世纪东方文学理论的发展

第四辑 :中西诗学对话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员舜数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员舜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延续

员舜中西诗学对话 :现实与前景

员舜异质文化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第五辑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员舜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

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

员舜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

员舜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员舜全球化与边缘话语的重建

员舜数语批评 :从失语到重建

第六辑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

员舜“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

员舜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

员舜中国诗学的“异质性”概说

猿猿论中国诗学的知识背景

附录：

猿猿理路探微：诗学如何从“比较”走向世界性

——对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解读

猿猿学术影响综述

论著目录：

猿猿著与编著

猿猿主要学术论文

猿猿作者简介

猿猿后记



跨文化： 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主潮

摇摇回首即将逝去的 21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从早期艰难的起步到中期的沉寂，再到后期的复兴与迅速发展壮大，既显示了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中的艰难与曲折，更日益展示出其文化沟通与整合的强大文化功能。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其根基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之上的，认识到这一点至为关键，因为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并进一步展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是制定我们 21 世纪长期的研究战略，指导下个世纪中国比较文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基本立场。

中国近现代比较文学的兴起，具有自发性特征，其根本驱动力就在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从 1908 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到 1908 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特征：早期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主要起因于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而不是受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的影响。众所周知，法国第一篇具有学科意义的比较文学论文诞生于 1836 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设立于 1852 年（戴克斯特，里昂），巴黎大学 1854 年才设立比较文学讲座，第一部全面阐述法国学派观点的著作，即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875 年才出版。事实上，当西方比较文学刚刚在西方兴起之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已经出版，鲁迅已在《摩罗诗力说》





中倡导并实践了“比较既周,爱生自觉”。而那时候,美国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威勒克才满 缘岁,当代法国比较文学泰斗艾金伯勒才刚刚出生。因此,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具有自发性特征,并有其内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于:中国比较文学是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从她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因而,中国学者的比较意识,不是“记文化功劳簿”、斤斤计较文学“外贸”的法国式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曰法国中心),也不是美国式的非民族化的“世界主义”,而是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焦虑,是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企求。这种焦虑和企求,最终演化为中西文化大论战,这种文化论战,又大大强化了中西跨文化比较意识:大批学者企图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中寻求中西文学互比、互释、互补、沟通、融会,乃至重构文学观念。显然,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直接导致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告诸往而知来者”,中国比较文学今后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化研究”,或者说着眼于中西文化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仍将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过,世纪之交的今天,已不同于世纪初的中国,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新一轮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兴起。与世纪初西风猛烈,横扫东方文化之况相比较而言,世纪之交的东西方文化的新较量,已经悄然到来。国内有学者指出:世纪末毕竟不同于世纪初,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以西学取代中学的情形,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现,恰恰相反,随着世界文化的转型,东方文化大有东山再起的复兴之势。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坚定了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信念,海外新儒学的兴起,国内对民族文化的寻根与反思,这一切无不显示了一种与五四相左的学人努力:“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将从中华文化传统的母床里获得再生。”^①作为当今学术泰斗的季羨林先生,提出了石破天惊的预言:“到了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之光必将普照世界,这就是我们的

① 邵建:《世纪末的文化偏航》,载《文艺争鸣》,原载《文艺》。

信念。”^①与此同时，美国学者亨廷顿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东方文化的重新崛起：“一方面，西方正处于权力高峰，但与此同时，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运动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彼此之间的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②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以上学者的看法，但却无法否认世纪之交新一轮文化较量的兴起。这种兴起，必将对 21 世纪比较文学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直接把比较文学推上“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一新阶段，比较文学将承担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对话、文化沟通和文化交融的神圣使命。亨廷顿曾预言东西方文明的剧烈冲突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耸人听闻之言，我们不能赞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可以通过东西方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起到加强相互理解，缓解文化冲突的巨大作用。这样说来，21 世纪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还是一支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它将是东西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互相理解的通道，异质文化互相沟通的桥梁。世纪之交，西方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跨越东西方文化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勒（Earl Moller）写出了跨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以研究实绩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意大利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Almondo Nischi）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比较文学”，他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③。可见，比较文学“跨文

① 季羨林：《在跨越世纪之前》，载《文艺争鸣》，1992（7）。

②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译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1996（5）。

③ 厄尔·迈勒：《比较诗学》，见《比较文学研究》，1992（1）；阿尔蒙多·尼希：《作为非殖民化学科比较文学》，见《比较文学研究》，1992（1）；伯恩海姆：《学科现状报告》，见《比较文学研究》，1992（1）。





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乃时势使然,而并非某学者或某国学者们一相情愿。

可以预见,跨越东西方文化 轍明圈的跨异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是 21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潮。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我们不但不必担心所谓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化 轍明冲突,而且我们应当欢迎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因为人类文化史常常提示我们,世界文化的高峰,往往是在文化大交汇,尤其是异质文化大交汇处产生的。在这多元文化碰撞与融通的文化大交汇之中,“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必将登上一个更加辉煌的高峰!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 年第 1 期)

是跨文化还是泛文化 ——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研究的战略性转变

摇摇世纪末,比较文学研究似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与此同时,也酝酿着一次新的转机与新的突破。

我们已站在十字路口,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一次重大的、全球性的战略转变!历史正向我们挑战,机遇正向我们招手。如何迎接挑战?怎样抓住机遇?这是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界、甚至是全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早在 20 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就曾出现过严峻的“危机”,而恰恰是那次“危机”,导致了当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转机与重大突破,产生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及其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方法,将全球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反观今日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已经呈现茫然和困惑之现象。再看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的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日益趋向不确定性,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用确定,或不屑确定。这种失去学科理论的茫然、困惑,这种不能确定或不屑确定学科理论的消解态度,必然将比较文学导向严峻的学科危机。国际上已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悦是责期程摹言颢颢颢子燥莫藏上菓登笔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悦是责期程摹言颢颢颢子燥莫藏上菓登笔端)”。



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着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①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前面所引苏珊·芭丝尼特(Susan Bassnett)关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的断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因此我认为: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歧途。

然而,当我做出这一断言之时,并不意味着否定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必然要与比较文化联姻,不过,这种联姻,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怎样通过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呢?我的主张就是“跨文化”研究,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研究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二、“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战略性转变

前面我们谈到,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反对将比较文学扩大为文化研究。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退回文学自身:“如果拒绝走向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将会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身份。”“比较文学将会以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应当说,卡勒主张退回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看法,确有其合理性,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看法,^②但这种看法却并不合时宜。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

^① 参见 悦霖著《跨文化研究》,悦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② 参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笔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那么,比较文学究竟是应当走向比较文化,或者说走向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研究,还是干脆退回文学,固守文学“中心”这块领地呢?看来,国际国内的比较文学界似乎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面对这一艰难的局面,众多比较文学学者似乎陷入了困惑与茫然之中……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难道除了走向“泛文化”或退回“文学本身”,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非也!“大道如青天”,“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一条从危机走向转机的通天大道,是一条将全球比较文学推向又一新阶段的坦途。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我们不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到文学之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并正确处理文学与文化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那么,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将比较文学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跨越文化,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第三堵“墙”的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这种跨文化研究,至少有两大基本的优势或特征:第一,它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第二,它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与过去西方中心相比较而言)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因此,它不仅仅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新阶段,而且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是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后的世界比较文学的又一个会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崭新阶段!

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呢?兹略举一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常常会产生令人诟病的“比附文学”。人们或许还没有忘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步阶段,这种“比附文学”情况尤为严重。为什么会产生“比附文学”?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者们就文学而论文学,往往忽略了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根源的探索,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浅度的、形似或貌同

的比较研究。在海外,袁鹤翔先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将西方“巴洛克”格调用到中国诗评方面,得出了“浅度的”乃至错误的结论;在大陆,由于忽略了深层文化的探源,而出现了肤浅者居多的“载与再模式”。文化的探源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模式而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与歪曲。例如用西方悲剧观来讨论中国戏剧,引起了中国有没有悲剧等问题的论争。如果仅仅从文学层面上来比较,简单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就悲剧观谈悲剧观,必然是“浅度的”,甚至会越争论越糊涂。事实证明,不从文化根源上探寻,不从中西不同的文化内涵、中西不同的人生观、生命悲剧意识等方面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无法深入探讨中西悲剧观等问题。其他如学界常常碰到的屈原的“浪漫主义”问题、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问题等,无不如是。^①显然,文化的探源和比较,深化了文学的比较,因此,我们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方法”必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但这种深化,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文化研究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加深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看“跨文化研究”的第二个优势或特征。为什么说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使比较文学成为更具有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的学术工作呢?因为跨文化研究使全世界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加关注异质文化的撞击、误读,寻求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并存、理解与会通。

众所周知,国际上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欧洲中心论”,随后是“西方中心论”。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圈内的文学比较。所以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韦斯坦因(哉)在一部教材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单一的一个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像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

^① 参见曹顺庆:《庄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87(1);《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87(4)。





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①这一看法,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中心”的比较文学观。这种狭隘的观念,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或全球性。叶维廉指出:“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中,正如韦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中是不甚注意的”。^②

然而,“时运交移”,在世纪之交,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西方比较文学界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惟我独尊了。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精译云译)的《比较诗学》,通过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打破了韦斯坦因的“疑惑”;近年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粤译云译)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它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美国比协会长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因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提出,正是时势使然,而并非某学者或某国学者们的一相情愿。“跨文化研究”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立足点,由过去西方单一文化轍明圈,转移到全球不同文化轍明圈之间,倡导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化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它更加关注于异质文化的撞击、对话、误读与沟通。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的基本功用,或者说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

① 韦斯坦因:《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中译本 缘-远页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缘-远

② 叶维廉:《比较诗学》缘-远页,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缘-远

“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点上,“跨文化研究”与伯恩海姆等国际学者所倡导的“将眼光转向全球”的精神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而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它既顺应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又深化和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使我们从“一头雾水”的困惑之中走出来,辨明方向,阔步前进。

可以预见,在比较文学的这第三阶段中,由于比较文学迈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它不但不会“死亡”,而且必将大有作为。危机即将消逝,转机正在眼前。目前,国际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们,正在描述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台港学者与大陆甚至已经在建构“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研究,正面临着又一次全球范围的战略性重大转变。让我们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比较文学研究的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新时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比较文学学科 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摇摇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各个发展阶段中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了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

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的、累进式的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

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涟漪式”学科理论结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问题,不同的学术切入点所形成的。正因为背景不同、问题不同、切入点不同,所以各阶段皆各自解决了某一方面的学科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阶段学科理论的互补性,包容性。“涟漪”正是这样构成的。

在这“涟漪式”结构中,每一个“涟漪”都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某一阶段。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至少有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往往令人疑窦丛生。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1816年)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德国学者,著名作家歌德,被公认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的人也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波斯奈特(1817年)。1859年波斯奈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比较文学理论的专著《比较文学》,(当时,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观点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肯定了后来确立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1856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





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世界比较文学~~》),关于杂志的性质,编者指出这是“一本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高等翻译艺术,同时关于民俗学、比较民歌学和类似的比较人类学、人种学的多语种的半月刊”。该杂志于1858年停刊。1859年,德国学者科赫(《~~西莱普运~~》)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史~~》),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正式开端。科赫为该杂志确定了如下内容:一、翻译的艺术;二、文学形式和文学主题研究,以及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影响研究;三、思想史;四、政治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五、民俗学研究。这些内容不但涉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而且还包括后来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例如,1865年索布里就写出了《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①

由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比较文学早期的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由法国人奠定,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它已经蕴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良好的比较文学开端,为什么偏偏会走向旨在限制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所谓“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轨道上呢?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认真深思过、探问过这一问题。威勒克(《~~威廉·莫泽~~》)曾深刻地批判过法国学派,但却同样并未深究过这一问题。

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其三,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兹详述之:

^① 参见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中译本参见于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